

● 中国古代文学

“中国古代文学流派研究”笔谈

[编者按]“中国古代文学流派研究”丛书系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文库系列丛书之一,2003年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丛书由陈广胜教授任编委会主任,陈文新教授任主编。张清明教授、胡德坤教授为丛书名誉主任。丛书一共八册:《中国文学流派意识的发生和发展——中国古代文学流派研究导论》(陈文新著)、《东晋玄言诗派研究》(陈顺智著)、《官体诗派研究》(石观海著)、《唐宋词流派研究》(余传棚著)、《明清散文流派论》(熊礼汇著)、《明清章回小说流派研究》(陈文新等著)、《神韵派研究》(乔惟德著)和《近代小说理论批评流派研究》(刘良明等著)。丛书出版后,引起广泛关注,许多同行专家就“‘中国古代文学流派研究’丛书与中国古代文学流派研究”表达了他们的评价、思考和期待。本刊特选发几篇,以飨读者。

[摘要]“中国古代文学流派研究”是一个集体项目,丛书作者全部是武汉大学文学院的教师。他们的研究旨在以作家作品研究为基础而又超越作家作品研究,尽可能全面地观照中国古代文学流派,提供一种新的思路,在系统性和理论深度方面取得进展,为中国古代文学学科的成长作出力所能及的贡献。丛书作者对流派的界定及其特征,多有独到的认识或辨析。许多重大问题的生发求解,如流派的统系意识、盟主意识、风格意识,如玄学理想人格,如官体诗派的文学史意义,如台阁体的合理性,如小说理论流派的再划分,如明清章回小说的流派风格,其结论笃实,又让人耳目一新,堪称实证考索和理论分析紧密结合的范例。丛书作者都有长时间的学术积累。他们分工合作时,既充分尊重个人兴趣,又注意整体的互相联系,这有助于文学研究流派的形成。

[关键词] 古代文学;流派研究;研究流派;学术积累

[中图分类号] I2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881X(2004)02-0133-17

流派研究的文学史意义

刘 勇 强

流派研究在古代文学研究中一向很受重视,辽宁大学出版社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组织了一套“中国古代文学流派研究”丛书,陆续推出了葛晓音的《山水田园诗派研究》、钟优民的《新乐府诗派研究》、艾治平的《婉约词派研究》、钟林斌的《公安派研究》、王英志的《性灵派研究》等一批颇具分量的专著;流派研究由于空白较多,范围适中,也逐渐成为博士论文的热门选题。20世纪80年代,南京大学中文系曾规划过一个“唐宋诗歌流派研究”的系列研究,主要就是由该校的博士论文构成的,先后出版了莫砺锋的《江西诗派研究》、蒋寅的《大历诗风》、张宏生的《江湖诗派研究》等富于开拓性的著作;此后,这一类选题向纵深发展,开始涉及文学史上的次要流派。据我所知,有关清词的流派研究,就有徐枫的《嘉道年间的常州词派》(杭州大学)、谷辉之的《西陵词派》(杭州大学)、沙先一的《吴中词派》(南京大学)、鲁竹的《浙西词派与顺康词

坛》等,其中有的也已出版,如金一平的《柳州词派》。至于单部的著作及论文,更数不胜数,如刘扬忠的《唐宋词流派史》从流派角度透视唐宋词的发展,充分显示出流派研究所具有的宽阔的涵盖面。

我在这里一上来就不厌其烦地罗列流派研究的论著,既是为了说明流派研究受学术界关注的程度,也是为了表明陈文新教授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学流派研究”丛书的与众不同。丛书所探讨的众多文学流派,不少是学术界没有专门研究过的,因此,对古代文学流派的学术领域有开拓意义。如宫体诗在宋、齐、梁、陈盛极一时,余波延及晚唐五代。但隋唐以来,贬抑观点渐成主流,导致宫体诗研究少有问津者。石观海教授的《宫体诗派研究》以洋洋20余万言,全面梳理宫体诗发展与特点,填补了中国诗歌史研究中的一大空白。尤其值得肯定的是,丛书作者对流派的界定及其特征,多有独到的认识或辨析。如有关近代小说理论方面的论著并不少见,一般研究者通常只划分为资产阶级改良派和资产阶级革命派两大流派,将诸多见解各异的小说理论批评家分别纳入这两派里。刘良明教授等的《近代小说理论流派研究》则指出,“这样划分,看起来两大阵线,营垒分明,却暴露出研究者囿于传统思维定势所导致的格局狭小、政治偏见局限两大问题。由于前面一个原因,研究者往往无视或遗落了一些重要派别的思想资料;由于后面一个原因,研究者往往以简单的政治派别的划分取代小说理论家文学理论批评属性的准确定位,产生了一些不符合文学理论规律的弊端。”正是基于这样的反思,此书将近代小说理论流派实事求是地划分为传统评点序说派、译介欧美西籍派、“新小说”派、资产阶级革命派和理论研究派。作者还淡化小说理论家的政治属性,按照小说理论批评特征,因实赋名地将“资产阶级改良派”改称为“新小说”派,同时又充分注意到各派之间的复杂关系及内部分化、变异,使得本书对近代小说理论批评发展演变轨迹的描述更为准确,得出的结论也更符合实际。

这套丛书的作者之所以能在流派研究中取得引人注目的进展,是与他们在相关课题上大都有长时间的学术积累分不开的。这一点使得丛书不仅在选题上饶有新意,而且在研究深度上也超迈前贤。如熊礼汇教授对古代散文素有研究,曾出版过《先唐散文艺术论》、《唐宋八大家文章精华》,对宋以前的散文有所总结,这实际上为分析明清散文确立了必要的参照系;同时,他又编刊过《公安三袁》、《明清散文集萃》等书,在明清散文方面也积累了丰富的资料和不少真知灼见。因此,他的《明清散文流派论》可以说是水到渠成之作,并顺势将明清散文的研究提升到新的台阶。如在论及唐宋派时,作者提出了唐宋派对秦汉派双重超越的重要命题。在“唐宋派鼓吹理学”、“唐宋派否定文学作品的艺术性”、“唐宋派以时文为古文”等问题上进行了认真的辨析,从而对唐宋派作了新的定位,不但肯定了它对唐宋古文运动精神的继承和发扬,也论证了它对所谓新人文精神的自觉接受。这些观点,有驳有立,理据兼备,反映了当今学术界对这一流派的新认识。

不但如此,这套丛书的各位作者还努力打破单一流派研究的局限,揭示特定流派的文学史意义和理论意义。例如,陈顺智教授的《东晋玄言诗派研究》,不但描述了玄言诗的发展,还列出“从东晋玄言诗看诗歌中的说理因素”专章,将有关问题置于整个诗歌史和普遍的理论层面加以讨论,使相关见解更具参考价值。事实上,在我看来,这套丛书最值得称道的地方,就是第一次从理论上全面探讨了流派问题。这集中体现在陈文新教授的《中国文学流派意识的发生和发展——中国古代文学流派研究导论》中。前面曾提到流派研究极受学术界关注,但在流派研究局面的背后,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对具体流派研究较细,却缺少理论概括,是较为普遍的现象,而这又反过来制约了具体流派研究。《中国文学流派意识的发生和发展》则不然,作为第一部专门探讨流派理论的论著,它不是对某一特定流派的描述,而是作者在自己一系列流派研究基础上的理论总结,是对中国古代文学流派高屋建瓴的归纳。全书共分为三章,首先通过探讨统系意识的发生和发展,揭示出流派与中国文学传统的紧密联系;由此展开的对盟主意识的发生和发展论述,又进一步揭示出流派形成与衍变的内在理路;至于对流派命名与流派风格的概述,则揭示出流派得以呈现的基本面貌。三章内容相互补充,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中国古代文学流派理论体系。很明显,作者是力图在流派纷呈的历史长河中,把握文学发展的深层脉络。这一点在他对汉以降四大诗学流派的考察中表现得最为突出。有关格调派、神韵派、性灵派和肌理派不同的理论内涵,各种文学批

评史著作及专题研究著作多有阐释,因此,本书关注的焦点不是四大诗学本身,而是它在整个文学史上的演变轨迹以及相互关联。虽然四大诗学在清代才发展成熟,但作者指出,无论是在汉魏六朝,还是在唐代,或是在明代,它们事实上已经几度出现,所缺少的只是一个以其理论主张为名称的标志。而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则在于某一理论主张产生的历史往往晚于该理论主张所对应的艺术实践的历史;某一理论主张由较为详尽的阐释演变为简洁明晰的术语,需要较长的一段时间等。正是由于作者的这种鞭辟入里的分析,使流派研究的文学史意义在理论上得到了充分的彰显。

这套丛书在个案研究与理论探索两个方面的成功,也启发我们进一步思考流派研究在文学史研究中的意义。概而言之,流派研究是一种兼顾共时性与历时性、文学主张与创作实践、宏观描述与微观考察的研究方法,而这样的方法在文学史研究中具有极大的潜力。

从共时性与历时性相结合的角度说,对流派基本特征的描述,有必要在一个平面上对组成这一流派的成员及其观点加以讨论。例如《东晋玄言诗派研究》和《宫体诗派研究》两书分别对玄言诗和宫体诗的审美价值作了讨论,这种讨论就是将玄言诗和宫体诗作为一个整体来看的,因此,主要是共时性的分析。但任何流派又不是一成不变的,都有起始、衍变、消退的过程。所以,这两本专著又以主要篇幅描述了玄言诗和宫体诗的历史发展,如《宫体诗派研究》就以专章讨论了宫体诗的文学传承、崛起的历史必然以及它所经历的发轫期、发展期、全盛期、衰飒期。即使是在较短的时段内,共时性与历时性的结合也见出流派研究的立体效应。又如《近代小说理论批评流派研究》所面对的近代小说理论,持续的时间仅数十年,且各派虽稍有先后、递进,又时见交错、重叠。因此,作者分章立目,大致以其基本特征为主;而在各派之内,又着力揭示其发展的历史差别,同样表现了共时性与历时性兼顾的眼光。

从文学主张与创作实践的角度说,流派研究也提供了一个极好的平台。流派总是与某种文学主张乃至理论联系在一起的,它强调的是文学的共同性方面,但从文学创作的特点来说,它的本质又是个性化的。如何处理共同主张与个性写作间的关系,是流派研究不能不重视的一个矛盾,也是流派研究的重要课题。可能由于宫体诗派成员众多,在文学主张上不如后世一些流派那样有始终如一的明确宣示和遵循,所以《宫体诗派研究》特别注重对作品本身的解读,这些解读往往十分精细地分析了相关作品的艺术表现方式,说明了宫体诗人既有一致的审美趣味,又有不同艺术追求,进而显示出宫体诗作为一个流派的丰富与变化。

再从宏观描述与微观考察的角度看,流派研究更突出的是文学现象的宏观层面,否则就无所谓流派了。但流派又是由一个个作家构成的,所以还需要对他们作微观考察。其意义不仅在于微观考察是宏观描述的必要补充,甚至也不能排除这样的可能性,微观考察的结果形成了对宏观描述的挑战,以致解构了宏观描述赖以存在的基础。在宏观描述与微观考察相结合方面,《明清散文流派论》处理得较好。作者在论及台阁派时,不仅综合性地阐述了它形成的文化背景以及基本的艺术精神和审美特征,还以较长的篇幅专门评析了杨士奇的散文艺术,而在散文研究史上,还很少有对杨士奇散文创作如此全面的论述,这一论述使人们对台阁体的认识由简单地贬抑,转变为更实事求是的认知。同样,在全面论述了公安派的理论渊源及其所包蕴的人文精神和他们的文原、文用、文法、文风论后,作者又以专节讨论了袁宏道《解脱集》的散文艺术。而在此书的《总论》部分,作者总结明清散文流派总体的演变趋向,说明明清散文流派越是后出,越是关心社会群体利益,越是强调散文的实用功能;对散文文学质素、审美特性及创作艺术的探索,越来越深入;流派的演变,既有后者针对前者末流之弊而发的特点,同时也有合理吸取前者长处的趋向。这些宏观判断因有前面对具体流派的微观考察支撑,也显得扎实可靠。陈文新教授等的《明清章回小说流派研究》在这方面也有独到之处,如在阐述“章回小说主要流派审美规范的确立”时,作者单立一节,讨论《隋唐演义》基本品格,作者从它与《长生殿》的对比入手,特别是通过贾宝玉的谱系归属这样一个极细微的小说史现象,证实《隋唐演义》与人情小说趣味相近,而与历史演义趣味迥异,从而深入透视出题材畛域消失这一小说史现象。

由于流派问题的复杂,丛书也有不周到或读者可能感到不尽兴的地方,我这里仅就管见所及,略提

一二,以就教于陈文新诸教授。按照通常的认识,文学流派是指一定历史时期里,文学主张与艺术风格相近的作家间自觉或不自觉的结合。《中国文学流派意识的发生和发展》对此有所辨证,明确提出了流派研究的三个层面即流派统系、流派盟主和流派风格,应该说,这是很有创见的。但对照丛书有关流派的研究,偶有不尽相合处。如《明清章回小说流派研究》依托作者对小说流派的长期研究,将章回小说类型的探讨引向深入。如书中提出《三国演义》之后历史演义的两种主要类型、《水浒传》之后英侠小说的三种主要类型、《西游记》之后神魔小说的四种主要风格类型以及人情小说的三种主要类型(路数)等,深化了鲁迅以来对明清小说类型的描述。不过,小说的题材类型与流派是否能划等号?如果不能,二者的关系如何?书中似乎未有专门的讨论。至于《明清散文流派论》分别讨论陈白沙和王阳明不同流俗的文论思想与散文创作,是否需要以“独立”名派,也可以商榷。

还有一点在流派研究中常见,这套丛书也大致如此,那就是对流派的分析与评价基本上都从正面展开,即使涉及流派之弊,也是从流派的衰落角度稍加提及。问题是,流派不只作为它本身,同时作为一种普遍的文学现象,其实际存在价值是否也还有值得探讨的地方呢?王夫之在《姜斋诗话》中曾对流派的产生提出了非议,他说:“立门庭者必恒钉,非恒钉不可以立门庭。盖心灵人所自有而不相贷,无从开方便法门,任陋人支借也。”这是从开门立派者的角度来说的;在同一书中,他还引前人“好驴马不逐队行”之语,讥讽“立门庭与依傍门庭者,皆逐队者也”。这又从附和成派者的角度对流派提出了批评。话虽然说得有些绝对,也略嫌苛薄,却不无道理。因为在文学史上,一方面确有不少“但开风气不为师”的榜样,非不为也,是不能也。另一方面,也不乏这样的先例,当流派形成之时,也正是同类创作趋于衰落之时。那么,怎样从理论上更全面的把握流派在一个时期文学创作中的真正影响,恐怕还需有一种超越流派的理论眼光。事实上,陈文新在《中国文学流派意识的发生和发展》中论及清人的盟主意识及其流派策略时,已经敏锐地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他认为王夫之等人对流派的否定是基于对明代流派纷争、特别是盟主的鄙夷心理,这是符合实际的。不过,他进一步指出,这种对流派的否定态度及其思维方式,也是一种特殊的流派意识,以及将袁枚与公安派的不同看成是“外在姿态”上的距离,也许就低估了清人在流派问题上的新见。文学创作中的流派总是以无流派、非流派为存在前提的,这可能也是流派研究真正的逻辑起点。

就总体而言,这套丛书在理论探索和个案研究两方面的成果,可以说为流派研究的进一步展开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也发挥了示范的作用。

(刘勇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文学研究园地中的一束奇葩

周 群

中国古代文学史因众多的文学家、文学流派而呈现出多姿多彩的风格。虽然学术界对流派的研究,已有多数学术成果问世,但陈文新教授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学流派研究”丛书基于对中国古代文学流派意识的历时考察,以更宏阔的学术视野,分别对东晋玄言诗派、宫体诗派、明清散文流派、明清章回小说流派、近代小说理论批评流派等进行了专题研究,分量厚重,堪称流派研究领域的代表性成果。此套丛书基于这样的理论思考:中国古代的文学流派理论可分为中国古代关于文学流派问题的理论和中国古代各文学流派的理论。目前,学术界对于中国古代各文学流派的理论成果较丰,而对于文学流派问题的理论迄今尚未有系统的研究,该丛书正是以此为研究对象。该丛书有总论,有分疏,不守陈规,学风笃实,神理互通,蔚为大观,填补了学术空白。综其要端,特点有三。

其一,既有统摄全套丛书的理论探讨,又有各种文学样式的流派专题研究。古人刊刻的丛书,用途十分广泛,张之洞曾劝为学者欲读古籍,必购置丛书,《书目答问》中说:“丛书最便学者,为其一部之中,可该群籍,搜残存佚,为功尤巨。”但是,古代丛书因刊刻者学识不齐,成就也相去甚远,如明人胡文焕的《格致丛书》、胡维新的《两京遗编》等丛刻颇受学人诟病;而张海潮的《学津讨原》、黄丕烈的《士礼居丛

书》、鲍廷博的《知不足斋丛书》、毕沅的《经训堂丛书》或董理诸子、或搜辑佚书、或疏解群经,都勘校精审,备受学林推重。而丛书的质量所以有如此殊异,与其是否具有鲜明的特质有关。大凡好的丛书,一般都按一定的类别相区分,是依一定的原则撰著而成。如正续《皇清经解》,汇辑了当时整理经籍的成果,《玉函山房辑佚书》、《汉学堂丛书》以辑佚为旨归等等。及至今天,丛书主要由汇刻而变为撰著,但统摄全套丛书的基本原则仍是丛书的特质所在。时下以丛书为名的出版物,有不少仅是冠以一定的名称,而将内容相类的多种书籍汇成一辑而已,没有贯及全套的内在灵魂。而陈文新教授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学流派研究”丛书则决然不同。该套丛书的作者都是学有专长的学者,他们在自己所从事的领域中已有长期的研究积累,本丛书是他们多年研究成果的一次升华,但这又与纯粹个人专著有所不同,全套丛书有贯及全书的撰著思想。这一思想得以实现,至为关键的因素是丛书主编对中国古代文学流派有深入系统的研究,主编自撰的《中国文学流派意识的发生和发展》一书既是该套丛书的一册,又是整套丛书的总导论。陈教授从三个方面细密地分析了中国文学流派意识的发展过程,对中国古代文学流派意识进行了历时考察,分析了各个时代流派意识的特点。更重要的是,将古代文学流派意识系统化,敏锐地抓住流派意识中最核心的三个元素,即:统系意识、盟主意识、风格意识。正由于有比较宏阔的学术视野和深入细致的研究,形成了通贯全书的指导思想和统摄全套丛书的灵魂,为丛书奠定了学术基础。

其二,提出了诸多学术新见。对于玄言诗,传统的观点认为玄言诗有“理过其辞,淡乎寡味”之弊。《东晋玄言诗派研究》的作者发现,玄言诗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对传统的突破和革新,玄言诗代表的是一种诗歌精神的嬗变,即从抒情到畅理、从忧患悲怨到和光同尘,并最终形成清虚恬淡、萧散自然这一新型的审美类型。对玄言诗的审美价值提出了新的见解,从诗歌美学方面分析了玄言诗盛行一时的原因,肯定了玄言诗在中国古代诗歌发展史上的地位。

《宫体诗派研究》集中表现了作者多年的研究心得,认为宫体诗的研究,不应将目光囿于萧梁太子东宫的围墙之内,而应该放眼整个南朝诗坛,结合当时的文化背景和文学思潮去寻绎它的传承、嬗变,给以恰当的历史定位。

《明清散文流派论》对台阁体的评价,不采用众多文学史和专著所持一概否定的态度,认为台阁体的出现有它的合理性,应将台阁体和台阁体末流之弊区别开来。对许多具体问题的看法,更是言人所未言,自成一说。如对“唐宋派以时文为古文”的辨析,对李攀龙“视古修辞,宁失诸理”的诠释,对王世贞《归太仆赞》中“余岂异趋,久而始伤”的理解,对归有光、方苞等人叙事写人喜用细节是否出自评话、小说手法的论断,对曾国藩“古文之道,无施不可,但不宜说理耳”的分析,都属作者自得之见。

《近代小说理论批评流派研究》则针对以往的研究者将小说理论批评流派划分为资产阶级改良派与资产阶级革命派两派的简单化的划分方法,提出对近代小说理论批评流派研究,必须注意两条基本原则:一,应当不带任何偏见地占有尽可能丰富的原始材料,平等地看待各个不同的理论流派。不能囿于先验的观念或见解,对某些理论流派的思想资料进行判断取舍,以免产生买椟还珠式的失误或遗憾。二,应当淡化小说理论家从属的阶级出身或政治派别,按照他们的小说理论批评特征给予恰如其分的理论派别名称,不能简单地以政治派别划分取代文学理论批评派别的准确定位。作者经过细致的考察与认真分析,按照理论批评主张的不同,将近代小说理论批评流派划分为五派:传统评点序说派、评介欧美西籍派、“新小说”派、资产阶级革命派和理论研究派。

《明清章回小说流派研究》更是三位作者多年研究成果的一次升华,提出了很多独到的见解,收到了新人耳目之效。如本书的重点之一是考察各流派的风格特征并比较流派之间风格的差异。而流派风格的差异,很大程度上表现为价值观念和表达方式的差异。作者详细地考察了小说流派不同,评价人物的价值尺度亦随之不同的特点。如《水浒传》和《金瓶梅》中对武松、西门庆的不同处理。《水浒传》是一部英侠传奇,作者是站在豪侠的立场上写世态人情;《金瓶梅》则是一部人情小说,作者是站在常人的立场上写世态人情。在《水浒传》中武松手刃潘金莲,击杀西门庆,体现出的是英武的形象。而在《金瓶梅》中,武松杀潘金莲只以凶残而不具豪勇。同样,《金瓶梅》中倾向于让人物接受家庭生活的考验,而在《水

浒传》中则倾向于让好汉们摆脱家庭的束缚。《水浒传》中威风八面的英雄好汉,在《金瓶梅》中甚至显得非常可怜。作者对不同流派的表达方式进行了分疏,认为《三国演义》较多承受宋元“讲史”的熏陶,《水浒传》较多承受宋元“小说”的熏陶,而《西游记》较多承受宋元“说经”的熏陶,很具体地说明了不同流派独特的价值观念和表达方式。这些都是很能启人思维的新鲜独到的见解。

其三,丛书在理论上采用开放式结构,从社会背景、文化心理方面对文学流派进行宏观审视,具有跨学科综合研究的特征,显示了主编及各位作者广阔的学术视野。如对于玄言诗的研究,作者认为,玄言诗的兴盛主要在于三个层面的原因:玄学哲学的终结向玄学人生观的实践的转化(逻辑的层面),诗歌创作主体由崇尚诗骚传统向习玄传统的变化(主体层面),社会环境、社会风气与文化心理向玄学人生观的倾斜(社会文化心理层面)。将西方结构主义的分析方法不着痕迹地运用于研究过程之中,得出了新颖独到的结论。《宫体诗派研究》一书特别注重市井文化对于南朝文人的深刻影响。《明清散文流派论》一书中,无论是讨论台阁文化精神,还是讨论陈白沙和王阳明对明代散文流派演变的影响,研究“桐城派”时对思想文化背景的关注,都不囿于文学的畦界,而对文学流派进行了全方位的文化观照。

总之,该套丛书,对于文学流派理论的系统化研究方面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有总论,有专题。是各位作者多年研究之结晶,是“十年磨一剑”的高水平研究成果,具有很强的原创性。

(周群,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文学流派研究与文学研究流派

王齐洲,李晓晖

文学流派研究一般是对中国文学史上曾经发生并产生过一定影响的文学流派进行历史的、文学的、文献的、文化的考察,以确定这一文学流派的形成过程、文学作用、历史地位和当代价值。武汉大学文学学院的学者们所进行的文学流派研究,大体上也是这样进行的。不过,他们研究得更深入、更细致、更有创新性。举凡流派与代表作家、流派与时代、流派与地域、流派与总集、流派与社团、流派与社会阶层、流派与题材、流派与风格、流派与理论主张等等,一切与流派相关的问题,都在他们的视野之内,这样就使得对文学流派的研究更全面、更系统、更完善,因而更具有学理性和现代性。

具体而言,这套丛书的特色有以下几点:

划分标准的切实性。对文学流派的定义,学界歧说颇多,具体标准也不一致。为了便于研究,丛书的每一位作者都在自己著作的引言或绪论中阐释了自己确定流派的基本标准。这些标准既不是照搬曾长期盛行的所谓“自觉”“不自觉”的分类,也没有局限于以往大家所公认的文学流派,不是简单地从概念出发而是从现象、事实着手,从而使文学流派的划分能既客观又较科学地展现中国古代文学流派的真实情况。

研究领域的开拓性。此前的中国古代文学流派研究多集中在诗歌流派领域,散文、小说等流派研究比较薄弱。武汉大学文学院学者们的文学流派研究对研究领域也有开拓。他们既有诗歌流派研究,如陈顺智的《东晋玄言诗派研究》、石观海的《宫体诗派研究》、余传棚的《唐宋词流派研究》、乔惟德的《神韵派研究》;又有散文流派研究,如熊礼汇的《明清散文流派论》;还有小说流派研究,如陈文新等的《明清章回小说流派研究》、刘良明的《近代小说理论批评流派研究》。这些研究视野开阔,有的拓展了研究领域,有的填补了研究空白,有的创立新说,都能给人以启迪。如宫体诗的研究本来就不充分,前人似也无人将其作为一个流派予以关注,而石观海的《宫体诗派研究》则别具慧眼,从文学流派的角度来研究宫体诗,自然会有一些新的发现和新的认识。

理论观点的创新性。阅读丛书中的每一本专著,都会觉得一阵阵清新之风迎面扑来。如陈文新在《中国文学流派意识的发生和发展》一书中提出流派的统系意识、盟主意识和风格意识,刘良明在《近代小说理论批评流派研究》一书中的“传统评点序说派”观点的提出与阐释,陈顺智的《东晋玄言诗派研究》一书中的“玄学理想人格”的叙述等,都能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是他们各自的研究心得与新得。

学术积累的厚重性。学术研究最忌讳浮躁、短视,当前的某些不良社会风气、不科学的评判标准容易使人急功近利。这套丛书不属于急就章,每本书的作者都有前期的研究成果作支撑。如熊礼汇在出版《明清散文流派论》前已有《先唐散文艺术论》问世,陈顺智在出版《东晋玄言诗派研究》前已有《魏晋玄学与六朝文学》问世,刘良明在出版《近代小说理论批评流派研究》前已有《中国古代小说理论批评史》问世,流派研究正是他们对自己长期研究课题的深入。

研究方法的示范性。丛书各作者在研究方法上,既不像某些研究古代文学的学者对西方理论不闻不问甚至厌恶排斥,也不像另一些研究者那样生搬硬套西方理论,而是有选择地引进西方理论,以提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既重视对作家作品的考察,又不局限于作家作品的考察,将理论与实证研究结合起来,做到融会贯通。丛书作者的目光也并不囿于古代文学的流派研究,还能将其推而广之,如熊礼汇在《明清散文流派论》的总论中就明清散文流派迭出的意义及对今人散文创作的启发的分析,就是对古代文学流派研究的一种深化,充分表明了古代文学流派研究的当代价值,是文学流派研究的新尝试,给以后的中国古代文学流派研究开辟了一条新途径。

武汉大学文学院学者们的文学流派研究成绩是可喜的。然而,仅仅满足于研究文学流派是不够的,因为文学流派研究已经不是什么新鲜话题,对于学科发展的影响是有限的;重要的是通过文学流派研究,形成有影响的文学研究流派,文学流派研究的深入正寄希望于文学研究流派的形成。

文学研究流派是指有共同的理论指导、一致的思想倾向、相似的研究旨趣、接近的研究风格的某一研究群体。文学研究流派的形成必然会深化文学研究理论,提高文学研究水平,促进古代文学学科的发展。虽然文学研究流派的形成不一定要从文学流派研究中产生,但文学流派研究是比较容易形成文学研究流派的催化剂。这是因为,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容易对研究者的思想、观念、方法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文学流派的统系意识、盟主意识、文体意识、风格意识、以至地域意识、阶级意识等等,也是构建文学研究流派所需要的,有些甚至是不可缺少的。凡是可以称为文学研究流派的,无不具有比较自觉的流派意识,或是在其研究实绩中反映出了这种意识。例如,程千帆先生的弟子中就有许多人做文学流派研究,而他们的研究便体现了形成文学研究流派的某些特点。上海古籍出版社总编赵昌平先生在《文学遗产》1992年第6期发表的关于程千帆、吴新雷著《两宋文学史》的书评中评价南京大学中文系古代文学学科说:“由于搞出版工作的职业需要,我常注意各研究单位的学术动态,总感到南大中文系,至少是中古段的群体力量是学术界的一种新气象:有老成典型的带头人,有功底深厚的若干中坚,更有一批虎虎生气、成绩突出的后起之秀,尤可贵者是能彼此紧密合作,有发展成特色鲜明的学派趋势。”赵先生这里说的学派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文学研究流派,而中国现时所缺少的正是这样的文学研究流派。可以设想,这样的文学研究流派越多,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就会越深入,成绩也就会越大。因为要形成文学研究流派,必须有研究理论的成熟,研究队伍的稳定,研究成果的积累,研究方法的创新,以及研究领域的拓展和研究优势的建立。

武汉大学文学院的学者们是否能够通过古代文学流派研究形成文学研究流派,现在还不好论定。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本丛书是一个集体项目,丛书作者们在1998年申报课题时就明确提出,他们的研究“旨在以作家作品研究为基础而又超越作家作品研究,尽可能全面地观照中国古代文学流派,提供一种新的思路,在系统性和理论深度方面取得进展,为中国古代文学学科的成长作出力所能及的贡献”。这种旨在围绕流派研究来系统梳理流派研究理论和实践的文学流派研究的新尝试,给以后的中国古代文学流派研究开辟了一条新途径。丛书的特色是既充分尊重各位学者的个人兴趣,又是一个相互之间有内在联系的整体,这无疑有助于文学研究流派的形成。

应该指出的是,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古代文学流派研究”丛书,严格来说并不是国内首套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流派丛书。此前,辽宁大学出版社已出版过一套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流派丛书,包括钟林斌的《公安派研究》、毕宝魁的《韩孟诗派研究》、葛晓音的《山水田园诗派研究》、周中明的《桐城派研究》、苒吉平的《婉约词派的流变》、钟优民的《新乐府诗派研究》、王英志的《性灵派研究》。然而,这套丛书不

是同时推出,也就缓解了它在学界的影响力。况且这套丛书的研究者分属于不同地域、不同学校,其学术背景差异很大,各人的研究是完全独立进行的,很难形成文学研究流派。而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这套“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流派丛书”,同时集中隆重推出,确有“重磅力作”的冲击力,影响不容低估。况且该丛书是一个集体项目的成果,有比较一致的研究思想和价值目标,丛书主编陈文新在《中国文学流派意识的发生和发展》一书中提出要重视中国古代文学流派问题的理论的研究,并对中国古代文学流派意识作了相应的理论描述,强调要研究文学流派的统系意识、盟主意识和风格意识,便为文学研究流派的成长奠定了理论基础。而迄今为止,学术界对中国古代文学流派问题的理论的研究相对薄弱,武汉大学文学院的丛书作者们在书中所体现的一致的理论倾向也就值得予以特别关注。

正是武汉大学文学院学者们的文学流派研究实绩以及他们对文学流派理论的思考,使我们有理由相信,他们对文学流派的研究今后还会有进一步的发展。在这里,请允许我们套用中国古代文学学会会长、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秘书长傅璇琮的话:他们的研究将在我国的古代文学流派(原话是“古典诗歌”)研究学术史上占有特定位置,其意义和经验必将日益为学术界所认识和汲取。

如前所述,近几年有关中国古代文学流派研究的论著数量不算太少,质量也属可喜,然而,这些(包括一些文学批评史著作)研究虽也部分包含了对一般流派理论的思考,但主要的侧重点不在中国古代关于文学流派问题的理论。所以,如果大家能够形成共识,加强文学流派研究中的流派问题的理论研究,并将理论研究成果自觉地贯穿到各种文学流派的具体研究之中,形成较为统一的研究特色,武汉大学文学院的文学流派研究或许会促成一种古代文学研究流派的产生。这正是我们大家所期待的。

(王齐洲,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李晓晖,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古代文学流派研究的拓展与深化

罗 小 东

流派研究是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一个相对薄弱的环节。如果着眼于与之相关的个案研究,不乏举足轻重之作,但就总体而言,系统而深入地研究仍然是这个学术领域的一个欠缺。由陈文新教授主编、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11月出版的“中国古代文学流派研究”丛书(以下简称“丛书”),以崭新的视角,第一次对中国古代文学流派意识的发生和发展进行了全方位、多层次的系统探讨,并且以相当的力度对已有的研究领域和研究成果进行了拓展和深化。可以说,该丛书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这个学术领域的空白,是近年来不可多见的学术力作。

首先,丛书以高屋建瓴、提纲挈领的学术魄力,对古代文学流派的理论进行了全面的梳理和总结,提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见解。这主要体现在作为该丛书导论的陈文新教授所著的《中国文学流派意识的发生和发展》一书中。

研究文学流派,就不能不涉及到一个如何确定流派特征的问题。依照一般的文学理论,文学流派可界定为在一定历史时期内出现的一批作家,由于审美观点一致和创作风格类似,自觉或不自觉地形成的文学集团和派别,它通常是有一定数量和代表人物的作家群。但是这种理论的界定在具体的操作层面常会引起分歧,尤其是在确定何为“自觉”、何为“不自觉”的时候。对此,著者在分析了古代文学流派理论资料和借鉴国外有关流派理论批评的基础上,提出了确定流派成立的标准,那就是“流派统系、流派盟主(代表作家)和流派风格”。著者正是以这三个要素作为衡量标准,考察了中国古代文学流派意识的发生和发展,并以此为基点展开了流派与思潮、流派与地域、流派与社团、流派与题材等多重关系的梳理,在流派理论的系统化和进一步深化发面,取得了重要进展。

在此要稍作强调的是,我以为将统系意识作为衡量流派成立的基本要素之一,是著者对古代文学流派理论所作的一个深刻总结,同时也不妨视之为著者对现代文学流派理论所作的一个创造性贡献。虽然在此之前也有研究者做出过类似的表述,如王运熙、杨明的《中国文学批评通史·魏晋南北朝卷》三

“有渊源继承关系的作家作品,就在诗歌史上形成了流派。”但这样的表述还是零星的。陈文新教授明确将统系意识作为衡量流派成立不可或缺的要害,并且将之上升为一种理论化的认识,指出:“每一个文学流派都是在一定的文学传统中展开的,对经典的选择是其文学活动的起点。”“他经由对经典的选择构成了他自身的传统或统系,并借助于这一统系来指导和促进他的文学事业。”“一个流派的统系选择,在某种意义上决定了该流派的基本艺术追求。”“明确的统系意识是开创流派的必要条件。”著者的这些论断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十分吻合中国古代文学流派发生和发展的历史,其典型表现就是“文统、诗统、词统”的建立。

值得赞赏的是,著者在分析研究流派的统系意识时,既重视揭示流派的历时态传承关系,同时也十分重视揭示流派在形成过程中共时态诸多因素的合力影响,以及在这种影响之下其统系选择的某种必然性。如著者在分析宋代的主流诗学代表江西诗派时指出:“江西诗派所选择的‘祖’是杜甫。”“祖”者即统系意识。著者认为宋诗的基本品格是重理,“以思理筋骨见长”。所谓“以文为诗”正是宋诗“理性精神在艺术表达上的体现”。宋诗这一特色形成的“前提”,在于宋代“自然科学和思辨哲学的长足进展”,以及“宋人保持和发展了对‘理’的持续不已的兴趣”,以至于“在相当一部分宋人的理念中,理智力量被视为诗的真正驾驭者”。在这一社会文化心理背景之下,江西诗派在“祖”的选择上必然是倾向于文学传统中那些有着“以文为诗”色彩的大家。这样的大家有杜甫和韩愈,而且后者的倾向性较之前者更为鲜明。那么何以宋人要冷落韩愈而选择杜甫?著者进一步从三个方面分析了潜藏于其背后的深刻缘由,强调了江西诗派在“祖”的选择上的自主意识,即充分考虑了“祖”的人格及其创作“是否足以成为表率并给诗派带来声望”。著者这些不落窠臼的分析有很强的理论说服力。

其次,该丛书还对学术界尚未全面系统加以研究的一些重要课题展开了更为深入的探讨,这些课题有东晋玄言诗派、宫体诗派、明清散文流派、明清章回小说流派、近代小说流派等。这些课题对于学界中人或许并不是完全陌生的,但可以肯定地说,它们中的一些课题在目前的研究中却仍显广度和深度不够,还大有可开掘之处,如玄言诗、宫体诗即是。在文学史上,囿于现代文学理论的局限和传统审美观甚至意识形态的束缚,玄言诗、宫体诗的命运往往是被漠视、被诟病的,极少有人问津。正如丛书作者之一的陈顺智教授所言,这种现象“作为一种文学欣赏”,或许“无可厚非”,“但作为一种科学研究”,则是“有失偏颇”的。无论是玄言诗还是宫体诗,它们在历史上都曾绵延了百年之久(广义的宫体诗派从它的发轫期刘宋时代算起)。有如此漫长的时间作为支撑的诗派,总有它自身生存的土壤,有时代的审美需求为之助力和壮势。作为研究者,应该用科学和理性的态度对之进行认真的研究和解读,而不是相反。我们高兴地看到陈顺智教授的《东晋玄言诗派研究》和石观海教授的《宫体诗派研究》正是我们所期待的这方面的有开拓性的新作。著者不仅详细探讨了玄言诗、宫体诗发展的历史阶段,而且从诗学传统、社会环境、文学思潮、文化审美变异等背景来寻绎它们的传承、发展和嬗变的理路,从而对玄言诗、宫体诗作出了较为允当的历史定位。他们在此基础上所提出的许多新观点,精辟而富于启示性。如陈顺智教授在其第六章分析东晋玄言诗的说理因素时指出:“用非理性化的方式写作说理诗,这实在是玄言诗的一个奇迹。玄言诗的思辨张力,首先在于概念不确定性带来的理解上的多重可能性,其次在于概念与概念之间跳跃性的推进模式。这样的诗歌结构在客观上为诗歌的理解增加了难度,同时又造成了一种陌生化的美学效果。”这种“陌生化的美学效果”即在诗歌中所构成的“智慧的快乐”,应该是东晋玄学时代文人名士所追求的最高审美境界,因此,“玄言诗在东晋是可以给人们带来快感的”。这样的分析对我们理解玄言诗百年才衰的历史无疑是极有裨益的。

丛书所涉及的另外一些课题,从单个作家作品的研究看,成果不少,但作为一个流派整体,研究它们的发展演变,辨析它们的艺术风格,揭示它们的审美特征及形成规律,以及美学追求和意义等方面,则仍有诸多不足。陈文新教授等的《明清章回小说流派研究》、熊礼汇教授的《明清散文流派论》和刘良明等先生的《近代小说理论批评流派研究》,都对上述的不足作了有力弥补,深化了这些课题的研究。如《明清章回小说流派研究》中关于清中叶才学小说的研究,就给人以学术视野开阔、分析深细之感。著者将

才学小说定义为:“这一流派也讲故事,但又不仅仅讲述一个或多个故事,它还论学说艺、数典谈经,充分展示作者的学问,有时甚至‘故事’让位于‘学问’;它的某些作品脱离了拟说书腔调,拒绝将读者假想为听众;它‘文备众体’,融合了历史演义、英侠传奇、神魔小说、人情小说等流派的特色”。根据这个定义,著者富有说服力地将《镜花缘》《野叟曝言》《蟬史》这三部在归类问题上争议较多的作品统一归入了才学小说类,把它们作为一个独立的小说流派加以研究,并且从《野叟曝言》与理学、《镜花缘》与乾嘉学派、《蟬史》与小说语言革新的关系的考察中,细致分析了“此派小说中契合那个时代的文化趣味、在小说史上具有独特意义的新的因素”。

熊礼汇教授的《明清散文流派论》也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探讨了许多新问题。如文派与学派、文派与诗派的同体生存、台阁体的文化艺术精神、康海的散文复古理论、王世贞前后散文复古理论的变化、心学理论对散文流派演变的影响等。在具体的研究中,著者不是孤立地看待散文流派,而是将其放在整个文学的生存环境和发展态势中去考察,在此基础上“揭示研究对象作为流派的总体特征和作为散文流派的文学方面的个性特点”。既注意对散文流派作整体的把握,即流派内众多成员观念和风格的一致性,以及作为流派的相对稳定性,也注意到了成员间彼此的同中之异和流派在发展过程中的变异性。

第三,在研究方法上,该丛书也表现出了一个共通性的特点,即比较方法的运用。这种比较既有流派与流派之间价值观念、题材取舍、表现方法、艺术风格等的比较,也有流派成因、流派影响的比较,还有流派盟主、流派内部成员间的比较等。如《明清章回小说流派研究》在考察各流派的风格特征时就常常运用比较的方法来揭示流派间的风格差异。比较从流派的价值观念和表达方式两个层面切入。著者认为小说流派不同,其价值观念也就不同,由此必然影响到小说作者对其笔下人物的描写和评价。如英侠传奇一般张扬的是豪侠的勇武,而人情小说关注的是常人眼中的家庭生活和世态冷暖,于是两部分属不同流派的小说《水浒传》和《金瓶梅》在武松和西门庆这两个人物的处理上就有了截然不同的不同。从表达方式看,流派之间的差异性也十分明显,即使它们使用的是同一种技巧。如悬念,作为历史演义流派奠基作的《三国演义》在悬念使用上有着更多的技巧痕迹,如锦囊妙计等;而《水浒传》却刻意去除技巧痕迹,悬念呈现出生活化的特点;作为神魔小说的《西游记》则与其情节的游记性质相吻合,多采用奇遇的方式制造悬念。不难看出,较之独立的作品分析,从流派间的比较入手,更能突出和揭示各流派代表作品的风格特点,也更能加深读者对这些特点的理解和把握。

以上三个方面是我阅读这套丛书时得到的最大感受,丛书在这个学术领域所作的探讨和贡献显然不止这些。学术研究是无止境的,我们不能期望一本书或一套丛书就能穷尽某个领域的研究,那是不现实的。

(罗小东,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

老题新做谱华章

陶佳珞

“中国古代文学流派研究”丛书是武汉大学出版社新近推出的一套颇有分量的学术精品图书,是武汉大学首批人文社会科学重大项目成果。作为这套丛书的责任编辑之一,笔者深感荣幸,同时,由衷地愿为这套丛书鼓呼,因为它的确让我目睹了学术精品的风采。

首先,这套丛书的选题具有学术前沿性和创新性。这是学术精品的重要标志。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是历史悠久的老学科,前修今贤的研究著述可谓汗牛充栋。如果人云亦云地重复做那些被别人“做烂了”的文章,显然是没有学术生命力的,必须另辟蹊径。该丛书的作者们依据对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历史和现状的深入考察,于1998年确立了研究的目标——中国古代文学流派。选择这样一个课题,可谓独具慧眼,因为中国古代文学流派的系统化、理论化研究,的确是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的一个薄弱环节。诚如该丛书主编陈文新教授所说,“就个案研究而言,与流派相关的研究成果,不乏举足轻重之作,如莫

砺锋江西诗派研究、葛晓音山水田园诗派研究、蒋寅大历诗派研究、张宏生江湖诗派研究等。但应该指出,这些学者的宗旨主要不是为了总结流派理论,而是系统钩稽与作者经历、作品版本、情节本事相关的资料,对作品的思想倾向和艺术得失作出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所以,尽管这些成果分量厚重,但从总结流派理论的角度看,还有许多工作要做。此外,学术界花较多精力认真考察过的流派,其涵盖面尚嫌狭窄,还存在着广阔的有待开拓的研究领域。”基于这种认识,丛书作者们开启了“从总体上论述中国古代文学流派研究的对象、特征、意义及其他相关问题,选择中国文学史上影响较大而学术界又研究较少或我们认为还有必要继续研究的文学流派作为系统研究的对象……从流派的形成、发展和特征入手,考察流派与思潮、流派与地域、流派与社团、流派与题材等关系,对其文化含蕴和审美祈向作全面而深入的研究”的新思路。沿着这一思路进行研究,就使得古代文学流派研究更全面、更系统、更完善,因而更具有学理性。选题的前沿性和创新性,是这套丛书得到专家学者好评的重要原因。

从研究对象看,东晋玄言诗派、宫体诗派、明清散文流派、明清章回小说流派、近代小说理论流派都是学术界尚未全面系统加以研究的课题,作者们的著作无疑填补了研究空白。

如《东晋玄言诗派研究》是陈顺智教授继《魏晋玄学与六朝文学》之后推出的又一部研究魏晋文学的力作,对玄言诗及玄言诗流派作了全面、系统和细致的探讨,这不仅深化了魏晋文学的研究,而且对玄学哲学的研究亦起到了推动作用。该著在东晋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哲学、宗教发展的宏大背景下,梳理了玄言诗产生、发展以至兴盛的演变轨迹,探讨了东晋玄言诗派的审美祈向和玄言诗的审美特征,并结合玄学哲学家的人格追求探求了玄言诗所表达的人生境界和人格精神。又如石观海教授的《宫体诗派研究》,首次从文学流派的角度研究宫体诗,认为“无论从内容而言还是从形式而言,宫体诗都以其重要的艺术贡献和特定的审美价值,成为中国诗歌发展链条上不可或缺的一环”,通过对大量宫体诗的具体分析,揭示了宫体诗独特的情感蕴含和审美特征,阐述了宫体诗的艺术价值和长期流传的社会历史原因,对宫体诗作出了客观的、历史的评价。该著的新认识有助于人们重新审视和思考中国古代文学流派研究的诸多问题。

从理论建构看,该丛书有许多原创性理论,新见迭出。这在学术研究中是难能可贵的。

丛书主编陈文新教授的《中国文学流派意识的产生和发展——中国古代文学流派研究导论》在中国古代文学流派研究中独树一帜,从流派统系意识、流派盟主意识和流派风格意识三个层面入手,对中国文学流派意识的产生和发展规律进行了系统的、深入的考察,在总结流派理论,发展体系化、规范化的流派理论方面作出了颇有价值的贡献。选择研究问题的切入点很重要,切入点选得准、选得好,就基本上抓住了问题的关键,很多相关问题都可以得到梳理和总结。该著正是选准了一个可以涵盖众多文学流派现象的切入点——流派的统系意识、盟主意识和风格特征。在这一流派理论的导引下,作者的流派研究不再停留于孤立的个案分析和评价,而是统合地上升到理论层面的阐释,将实证研究和理论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融会贯通,推陈出新。

熊礼汇教授的《明清散文流派论》在对明清散文进行系统研究上亦颇有理论创获。面对纷繁而多变的明清散文流派,作者选择从三个方面入手探明明清散文流派形成、嬗变的特点及其审美祈向和风格特征:“一是从考察整个文学的生存环境和发展态势入手,以确立散文流派在文学发展史,特别是在散文发展史上的地位”;“二是从考察思想演变特点入手,弄清散文流派形成的文化动因”;“三是从散文发展的实际出发,探寻散文流派的文学成因”。遵循这样的理路,通过对大量明清散文作家作品的具体剖析和宏观整合,作者总结了明清散文形成和演变的四个动因,即社会政治环境的制约,如明代洪、永以后,为文以平正典雅为宗,台阁派应运而生;一定的思想理论对散文流派的形成有引发作用,对其演变有催化作用,如台阁派、桐城派均以程朱理学为其思想理论基础;前一流派末流之弊的蔓延,会成为后一散文流派崛起的直接动因;最高统治者的文风取向,对散文流派形成、演变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这样系统化的理论阐释在以往的明清散文研究中尚未见到,熊著论从史出,更上一层楼。

近代小说理论流派的研究主要考察清末民初小说理论批评流派的理论主张、价值取向和批评实绩,

评价其在中国小说史上的地位和作用。过去这方面的研究受传统思维方式和政治偏见的束缚,存在着格局狭小、简单化的缺陷。丛书刘良明等先生的《近代小说理论批评流派研究》则冲破了传统思维模式的禁锢,从新视角看取活跃于清末民初的各种小说理论批评流派,提出应淡化小说理论批评家所从属的阶级出身和政治派别,不帶任何偏见地尽可能占有丰富的第一手材料,在此基础上全面客观地评价各小说理论批评流派的观点及其理论价值。遵循这一理论,作者认为应按照理论家的小说理论批评特征为流派命名,即因实赋名,如可将以梁启超为代表的小说理论批评流派称为“新小说派”。按照这一原则,过去许多困扰小说理论批评流派研究者的问题都容易解决。

其次,该丛书的作者队伍整体水平高,保证了丛书的整体质量和应有的影响力。该丛书的主要撰著者都是在中国古代文学或古代文论领域研究了20多年的专家,所撰论著均为这些专家长期关注和研究的课题,且前期已有许多相关成果,因此该丛书绝不是“短平快”的应景之作,堪称“十年磨一剑”。同时,该丛书作者语言流畅、文笔清通,使丛书寓学术性和可读性于一体,内容和形式和谐统一。

该丛书的上述特点,决定了它必定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界引起关注,必将推动文学流派研究的进一步系统化和理论化。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虽是“老题”,但并不是“没有文章可做了”;恰恰相反,还有很多值得探讨的课题,还有许多文章可做。从发展学术和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供精神动力的需要来看,出版这套丛书是有重要意义的。

(陶佳珞,武汉大学出版社副编审)

文学史宏观微观研究结合的重要成果

王 立

武汉大学陈文新教授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学流派研究”丛书面世了,这是中国古代文学史研究中的一件大事。照我看来,其建树主要有三个方面:

首先,是众多新范畴新命题的创立,以及对于近年研究见解的补充生发。文学研究,一般来说是由文学评论、文学史和文学理论组成,而该丛书则是偏重在后两者的结合,事实上是以有关文学流派的理论应用于文学史研究实际。其实践性意义还在于,丛书创立了“统系意识”、“盟主意识”、“风格意识”三个核心术语以建构古代文学流派意识的理论构架。还尽量辨析纵横交错的内在关系,并且不讳及某些辨识角度的局限性,如“导论”对以题材命名流派的应用范围有限的讨论,认为其面对作品特征不够清晰时、作品题材杂糅时无能为力,非常深入,切中肯綮。

“宫体诗派”中对于构成萧梁宫体诗派作品的四个系列(乐府、美人、自怨、体物寓情的咏物)的陈述,注意到其体物寓情的咏物诗要求所咏之物不仅写得巧似,更重要的是要隐含一个“情”字,进而辨析了“历史文化语境的不同,抒情主体寄寓于所咏之物的‘情’便有明显的差异”,这就没有把论题简单化。而“明清散文”以识见美、健逸美、文境美、语词美概括陈白沙山林散文艺术美特征;讲自己熟悉的老乡公安派提出了以“水文化精神”为主的乡土文化精神的命题等,也令人耳目一新。

“章回小说”一部,因体例关系作为附录的“明清公案小说”一章,对于研究较少的明清公案小说,进行了卓有新见的讨论,特别是对于“书判体”演进及特征等论述,颇有创意。而“近代小说理论”针对先前以资产阶级改良(维新)派与资产阶级革命派划分小说理论见解的笼统图解,在细致考察后细分为五派:传统评点叙说派、评介欧美西籍派、“新小说”派、资产阶级革命派和理论研究派。这种先前未见的划分,广泛吸收了郭延礼等学者的相关论著,更加客观地反映了近代小说理论批评流派的总体格局。

“玄言诗派”在纵向维度上讨论了玄言诗发展四个阶段后,对其兴盛成因的概括,也没有因循学界成说,而是在三个层面,从最主要的原因论,从玄学哲学的终结向玄学人生观的实践的转化,诗歌创作主体由崇尚诗骚向习玄传统的变化,社会环境风气向玄学人生观的倾斜,综合考虑问题。该书在“理”的探讨上颇下功夫,概括出中国诗歌说理的四种形式及特征“形而上的说理”“问有理语的说理”“议论化之

“理”和“意境化的说理”,由此就逼近了论题的核心,于是特定流派的特征也就易于揭示。

其次,丛书做到了宏观的视野与微观的实证有机结合。丛书严谨立论的同时,力求推陈出新。如“明清散文”对于散文流派领袖(盟主)们代表性主张的考察,尤其注意与其创作有机结合,像“独立派”的陈白沙“自然”“自得”说与其文论观和山林散文艺术精神和审美特征关系的剖析,细密缕分,又如康海散文复古理论、王世贞散文主张前后变化以及公安派性灵说和王阳明良知说关系等问题,所论都多发新见,相当到位。而揭示出演变规律趋向为越是后出,越关心社会群体利益强调实用功能等,亦令人信服。

“近代小说理论”在总结林纾“以小说为兵书”的倡导时,也没有停留在问题本身,而追溯了这种倡扬的传统由来以及它与林纾其他相关主张的关系。该书甚至还把学术触觉伸展到吕思勉《小说丛话》上,这是较少有人谈到的。

“宫体诗派”在具体微观的文本解剖中,运用意象母题史研究方法,寻求出宫体诗派创造出的意象群,分解出器物、居处、禽鸟、草木、天象、昆虫等六类,各自统属若干有一定分布面的惯常意象(如器物意象就细分为扇、镜、灯、幔、帘、漏、琴、笙、笛、簾、琵琶等),考究出各自何人何诗始,这实际上是借鉴了古代类书的二级分类方法,具有实践性而又符合创作实际。该书又在具体微观分析的基础上,总结概括出具有宏观意义的思想:“仅就上述的数种意象而言,宫体诗塑造意象的种类之多,范围之广,是前代的任何一个时代都无法比拟的。它在拓宽诗歌表现领域、开阔诗人形象思维方面,做出了衣被后人的重要贡献。”在此基础上提炼的该诗派女性化审美特征,就有了微观的实证性依托,不会产生疑义。

在宏微观结合时丛书十分注重从文化的眼光看待文学现象。像“明清散文”考察散文流派演变动因时,就一从文化思想变化角度考察流派迭出成因;一从某时代文化思想特色入手考察某流派文学主张成因;一从文化思想入手考察流派领袖追求的人文精神。这样,对于台阁派、公安派、桐城派等具体流派的讨论就不是单摆浮搁,而是在一个网状的结构中透视。

其三,既注重普遍性又不忽视特殊性,多种方法并用以掘出文学流派的规律内蕴。“宫体诗派”以其特定的诗歌题材断代研究,注重从“意象——题材——模式”的角度把握对象,该书充分吸收了近年学界成果,又自出新意,将宫体细分作“乐府艳情”“美人”“咏物”“闺怨”“人生无常”诸多系列,在具体分析源头时又不限于诗歌,而旁及咏物赋,这样对永明及此后诸多咏物诗的定位就因有了参照而更加准确。而咏物是一般普遍的现象,“咏物寓艳情”则是该流派该时代的特殊现象,“永明诗人常用的拟物为人的移花接木法,也是他们在艳情主题的驱使下,对鲍照所开创的借写物而寓艳情之笔法的一种继承和张扬”,结论在多重参照下得出,令人信服。而列表和不列表的统计,进行定量分析法,更是该书的拿手好戏,这样,作为唐诗高峰的海前之河,六朝诗歌题材、作者的大致流脉,有不少都变得十分清晰,读起来甚为作者冰山下面的细心周密功夫而叹服。

又如“章回小说”在比较不同流派小说中“悬念”运用的差异时,注意到受宋元讲史熏陶的《三国演义》主要以锦囊妙计和个别吩咐“如此这般”制造悬念;承宋元说话四家中小说一家的《水浒传》,是瞒住读者,生活化,让人看不出痕迹;而讲经流脉下的《西游记》,则以游记不断换形的方式制造悬念。对于“悬念”构成,虽也可从别的一些方式解释,但一经如此从文学流派角度阐发,的确入情入理。

因此,如果我们说该丛书具有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持久学术史价值,是不缺少切实根据的。

顺便提及,该丛书的布局分布,虽不免有着本校人员范围内的限制,但基本上勾勒出了古代文学流派的大略,是颇费匠心的。作为丛书主编的陈文新教授,承担了“流派丛书”文学史中段诗歌、小说流派研究的大量任务。前期有“玄言”“宫体”两大诗派的专著,晚期有“近代小说理论”,而又有“明清散文”的巨著,为了与“章回小说”这一册减少交叉重复,陈文新教授的“导论”尽量把重点放在诗文流派上,且着意与国内学界已经成书的如大历诗人、江湖诗派、明代复古运动等专著避开,这样,丛书主编就不仅注意到丛书本身整体内在的联系,而且注意到了与学界既有相关成果的联系,从而较大程度上能言他人所未言,言他人所未尽言,追求原创,实在是令人赞赏。而“导论”一册所附录的“明诗流派评论资料选编”把相关原始资料陈列出来,既带有实证意义,又使得该册分量加重,全套书变得更加均衡。应当说,这不就

是太史公“互见法”的一个成功运用么?丛书编著者这种良苦用心,体现了一种诚信的学术风格,确实值得肯定和揄扬。该丛书在有限的册数和篇幅内,虽非将古代文学流派一网打尽,荦荦大者也算基本具备了。作为严格意义上的、有明确宗旨和体系的第一套文学流派丛书(20世纪90年代初期辽宁大学出版社也出版过一套如葛晓音《田园诗派研究》等),开创之功真是功不可没,其系统理论思考更是我们下一步继续研究的新起点。

(王立,辽宁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东北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

为宫体诗正名的一部力作

王小舒

石观海先生的《宫体诗派研究》是一部为宫体诗正名的力作。众所周知,南朝宫体诗过去长期被视为“淫秽文学”、“亡国之音”,很少有人问津,但作者却毅然选择了这一课题,此当然不是出于觅寻冷门的考虑。该著作最引人注目的方面就是为宫体诗“正名”,即推翻加在它身上的千年“罪状”。作者指出,在文学史领域实际上存在着双重标准,“既然对《诗经》中表现郑卫之风的所谓‘淫诗’可以采取揄扬的态度,既然对南朝乐府中表现世俗情爱的吴声西曲可以采取肯定的态度,那么,对南朝文人表现同一主题而且在描写程度上尚较收敛的‘艳诗’似乎也应该采取宽容的态度”。此实际上运用的是反推办法,的确击中了过去研究存在的弊病,但毕竟还属于表层的,更重要的,乃在于作者替艳情诗作的正面辩护。他指出,两性之爱是天经地义的文学母题,“美人情结”在中国文学中其实是始终贯穿的,只是由于儒家诗教学说占据着统治地位,这一流脉才受到了严重压抑。南朝时期乃是文学观发生新变的时期,诗歌创作突破了正统观念的束缚,“吟咏情性”大行其道,宫体诗派这才脱颖而出,蔚为大观,它本是人性解放、进步的表现。因此,鄙视艳情诗,将其视为“亡国之音”“垃圾文学”,本身就是一种迂腐的、虚伪的文学观念。

作为一部流派史,《宫体诗派研究》还为我们梳理了一条宫体诗从发生、发展到蔚为大观的轨迹。作者并不满足于就宫体诗谈宫体诗,他还要向上溯源,一直找到中国诗歌的源头之处。这样,我们就看到了另外一部诗歌史,它有着与过去完全不同的对中国诗歌的描述,《诗经》、楚辞、汉赋、汉乐府、魏诗、晋诗、南朝乐府,那是一个充满了两性之爱的世界。过去人们看到的和长期强调的是民歌中的两性之爱大量被文人的政治寄托所改造,形成了所谓“香草美人”的传统,但石先生却指出,实际上还存在着另一种倾向,“有些文人的创作开始偏离比兴寄托的伦理美层面的‘美人’,逐渐瞩目红尘世界中令人赏心悦目的‘美人’,他们的作品客观上使‘美人’从性别被淡化了的伦理云端逐渐回归女性的本位,为后世醉心于女性美的文学创作走出了先轍”。这无疑是一个新的发现,把过去为人们忽视的一面给揭示出来了,我们不能不重新审视南朝以前的诗歌。过去人们常常听到这样的感慨,中国历来缺少真正的爱情诗,果真如此吗?

石先生还将宫体诗派的全程划分为四个阶段,即刘宋的发轫期、南齐的发展期、萧梁的全盛期和陈代的衰飒期,这与学界一般的认为宫体诗仅流行于梁代的看法不同,他指出:“宫体诗并不是萧梁诗坛上的一种孤立现象,也不仅仅是活跃于太子东宫中的一个独特的诗体。它的出现具有南朝人士追逐市井文化的深刻背景。”这一观点我认为非常重要,从某种程度上说,所谓宫体诗实际上就是文人的艳情诗,从这个角度看,它的存在已经超出了萧梁一代。关于这一点,刘师培的《中国中古文学史》也曾指出过,但此书的论述更为明确,证据也更充分。至于文化背景,那是一种社会风气,绝对是多元化的,而作者独独举出市井文化来,显然有他自己独特的认知。该书又将宫体诗归纳为四个系列,即乐府、美人、闺怨和咏物,这是第一次对宫体诗进行细化的分析,对我们把握该诗体的内涵和外延都具有重要的帮助。从这一分类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民间文学,特别是东晋、南朝乐府对宫体诗创作有着巨大的影响,可以说,无论哪一个系列都有乐府诗的影子潜伏其中。这一点也是作者特别予以关注的,他曾在第一章中指出:“晋代乐府中《桃叶歌》、《碧玉歌》、《团扇歌》之类的吴声歌曲对他们(南朝文人)潜在的‘美人’情结也起

了相当的激活和催化作用。”“美人”情结“是当时社会文化氛围、文艺思潮演变、民间文学与文人文学互动通过作者作用于文学创作过程的一个中介”。作者实际上想告诉人们,从灵感到艺术表现,民歌都给了宫体诗以丰富的乳汁和营养,而这一点,过去治文学史者都有意无意地回避了。假如我们将南朝乐府民歌与宫体诗放在一起考察,可以预期,会获得许多新的发现,这大概就是作者强调市井文化背景的原因吧?

实际上,在乐府民歌与宫体诗之间,除了性爱这一点相同之外,它们还是存在着相当差异的,这些差异应该主要来自生活。民歌感情真挚,由于平民的生活单纯而充实,宫体诗则往往苍白做作,似乎在逢场作戏,正如石先生在评价江总诗时指出的:“过惯了醉生梦死的优游生活,难以感悟真正的哀愁为何物,使得其诗前半部所咏的愁情显得虚飘,后半篇所咏的艳情又过于秾丽,而愁情与艳情的无机混合则大大削弱了诗歌以情动人的力度”。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宫体诗的通病。我们在充分肯定宫体诗的历史贡献的同时,是否也应该对它的缺陷加以明确地批评呢?

(王小舒,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

古代小说流派研究的开拓与深化

沈伯俊

新时期以来的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云蒸霞蔚,硕果累累。随着作家作品研究的深入和研究视野的拓宽,研究的路数和方式也日益多样化。陈文新教授等著的《明清章回小说流派研究》(系其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学流派研究丛书》之一),便是一部在研究方式上具有学术创新意义的著作。

古代小说流派研究,肇始于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然而,在将近一个世纪的漫长岁月里,尽管大多数学者接受了鲁迅对古代小说流派的命名,但往往着眼于体裁和题材的划分,而以“流派”的眼光进行观照,则是研究中的一个薄弱环节。从20世纪90年代初起,陈文新教授就已开始重视古代小说的流派研究,出版了《中国文言小说流派研究》一书(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9月),表现了当时还是青年学者的他的开拓精神。此后的10年间,他继续关注这一重要问题,继出版52万余言的《文言小说审美发展史》(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年)之后,又完成了这部《明清章回小说流派研究》。可以说,这是他的古代小说流派研究的进一步深化。

综观《明清章回小说流派研究》,有这样几个突出的特点:

第一,自觉而鲜明的流派观念。明清章回小说的四大类别——历史演义、英雄传奇(本书称之为“英雄传奇”)、神魔小说、人情小说,早已被学者们反复研究。不仅各种小说通史要加以论述,而且各种小说断代史、小说题材史更要予以重点讨论。而以往的研究,大多把这四大类别视为小说题材的分类。这样做,当然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而且是被普遍接受的。陈文新教授换了一个视角,把这四大类别看做四大流派,这实际上是小说观念的一种新变。如此观照,自然需要一定的流派理论支持。而在这套丛书的提纲挈领之作《中国文学流派意识的发生和发展》一书中,从中国文学史上众多流派形成的事实中拈出衡量流派的三大要素:流派统系、流派盟主(代表作家)和流派风格。以这三大要素作为判断流派的标准,可谓高屋建瓴,独具只眼。按照这样的眼光,把四大小说类别视为四大流派是可以成立的。试以历史演义小说为例。自杰出作家罗贯中以雄视百代之巨才完成历史演义的开山之作《三国演义》以后,继起的历史演义作者、评点者纷纷以它为楷模,有意无意地与之较长论短。如明代嘉靖年间李大年的《唐书演义序》,称熊大木的《唐书志传通俗演义》“虽出其一臆之见,于坊间《三国志》、《水浒传》相仿,未必无可取”。万历年间徐如翰的《云合奇踪序》云:“有若《三国志》、《水浒传》,令人一见便解……《三国》偏而弗全,《水浒》杂而多秽,孰有若斯之春容博大者哉!”可观道人的《新列国志叙》更指出:“自罗贯中氏《三国志》一书,以国史演为通俗演义,汪洋百馀回,为世所尚。嗣是效顰日众,因而有《夏书》、《商书》、《列国》、《两汉》、《唐书》、《残唐》、《南北宋》诸刻,其浩瀚几与正史分签并架。”这些论述,都说明历史演义的作者

们有比较明确的统系意识(以《三国》为宗)和盟主意识(以罗贯中为效法和竞争的对象)。而诸多历史演义作品徘徊于史实与虚构之间的艺术精神,大处着笔、因事见人的写作方式,又表现出一定的风格共性。正是因为具有这种自觉而鲜明的流派观念,本书在论述中便特别注重对“流派”的整体把握。

说到“整体把握”,近一个世纪以来,特别是新时期以来,各种小说通史、断代史、题材史、体裁史,其实都在作这方面的努力。仍以历史演义小说为例。齐裕 教授主编的《中国古代小说演变史》(敦煌文艺出版社1990年出月第1版),第三章《历史演义小说》的第一节《概述》,对什么是历史演义,历史演义与历史的关系等重要问题作了概略的论述,并将历史演义分为三种类型:其一,基本上是演绎史书的作品,如《东周列国志》、《西汉演义》等;其二,基本符合史实,但有较多艺术虚构的作品,如《三国演义》等;其三,取材于当时邸报、朝野传闻的时事小说,如《樵史通俗演义》等。石麟教授的《章回小说通论》(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9月第1版),第二章《类别论》中专设《历史演义小说》一节,概括了它们的三大共同特点:其一,在重视历史真实的基础上,将历史、传说、想象融为一体;其二,在向读者普及历史知识的前提下,将历史、现实与理想打成一片,反思既往,殷鉴后来;其三,在讲史话本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又未能完全摆脱“讲史”之羁绊。笔者承担李保均教授主编的《明清小说比较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年10月第1版)第二章《明清历史演义小说比较研究》,也初步概括了明清历史演义小说共同的创作规律:其一,以史为经;其二,以儒家思想为准绳;其三,亦实亦虚;其四,因事见人。纪德君博士的《中国历史小说的艺术流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3月第1版),则分别探讨了历史演义小说的生成机制、艺术流变、创作思想、叙事结构等问题。这些研究,或综合,或分析,虽各有所长,但都主要是立足于“类别”的把握,特别重视历史演义与其他小说类型的区别。而《明清章回小说流派研究》一书则紧扣“流派”观念,特别重视历史演义之所以形成一个流派的共性,第一章便是《章回小说主要流派审美规范的确立》。因此,尽管研究的对象基本相同,采用的资料大致相当,本书仍然体现出独特的理论色彩,给人以强烈的新鲜感。

第二,别开生面的流变关系梳理。伟大的历史学家司马迁在《报任少卿书》中提出的“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乃是一切治史者的奋斗目标,当然也是所有治小说史者的努力方向。这里的关键是“通古今之变”,即透彻地把握古代小说发生、发展、演变的历史。应该说,新时期以来的各种小说通史、断代史、题材史、体裁史,在这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不过,多数学者对古代小说流变关系的梳理,用力最勤的是流变的“过程”,是这一过程的“阶段性”,是要通过对不同历史阶段小说的形态、艺术特征的描述,力求寻觅古代小说兴衰起伏、承续演化的规律性认识。而《明清章回小说流派研究》一书则另辟蹊径,着重致力于明清章回小说各个流派的分化演变,“希望能对各流派的生存状态有较为清晰、完整的了解,并藉此进一步认识明清章回小说流派”。试看第二章《四大章回小说流派的分化演变》的纲目:一、《三国演义》之后:历史演义的两种主要类型;二、《水浒传》之后:英雄传奇的三种主要类型;三、《西游记》之后:神魔小说的四种主要风格类型;四、从《金瓶梅》到《红楼梦》(上)——人情小说的三种主要类型;五、从《金瓶梅》到《红楼梦》(下)——《红楼梦》对人情小说三种路数的扬弃;六、《红楼梦》之后:续红之作及狭邪小说等。这样的梳理,虽与其他小说史论著时有交叉(如将历史演义的演化分解为“准史书体”和“准话本体”两类,与前述齐裕 等学者的“三分法”大同小异),但读罢全书,留给我们的主要印象,不是明清章回小说发展的“阶段性”,而是章回小说各个流派的“总”与“分”,“正”与“变”,强化了对不同流派的认识。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上面的比较,只是为了便于探讨《明清章回小说流派研究》在研究视角、思路 and 理论上的创新之处,绝非认为流派研究高于题材、体裁研究。我历来认为,每一种研究方法都具有自己的长处,它们之间并无高下尊卑之分;各种不同的研究视角、思路 and 理论互相配合,才能更全面地把握无限丰富、无限生动的研究对象。

第三,清醒的理论“边界”意识。本书将明清章回小说划分为几大流派,主要是从题材角度入手的。作者凭借中青年学者的蓬勃锐气和扎实功底,满怀自信地进行探索,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基本上达到了“提供一种新的思路,在系统性和理论深度方面取得进展”(从书《总序》)的目标。然而,作者清醒地

认识到,任何一种学术理论都有其“边界”,都不是万能的。正如《中国文学流派意识的发生和发展》一书第三章中所说:“以题材命名流派,虽然有其不容忽略的长处,但其适用范围之有限也是毋庸置疑的。”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在衡量流派的三大要素中,风格是最重要的一个。该书《引言》说得好:“流派风格是文学流派的基本标志。无论是统系的选择,还是代表作家的产生,其指向都是独特的流派风格。没有独特的流派风格,就没有流派。”而恰恰是在风格上,明清章回小说的四大流派内部,差异颇大,相似度不高,比之诗歌中的山水田园诗派、边塞诗派,“同”的一面似乎不够突出。这不能不成为影响小说流派研究继续深入的一个难以回避的问题。作者没有因自信而导致盲目,在大胆开拓的同时保持着清醒,看到了以题材命名流派的局限性,这是值得称许的。

总的说来,《明清章回小说流派研究》是一部有真知灼见、有理论建树的佳作。尽管我对书中的某些具体论述还有不同意见,但它和《中国文学流派意识的发生和发展》,仍给我许多启示,使我受益匪浅。我衷心希望作者进一步深化自己的研究,向着“建立一个兼具多样性与统一性的中国古代文学流派研究体系”的目标继续前进!

(沈伯俊,四川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 何良昊)

Literary Schools Studies of Ancient China: Pen Talks

Abstract: Studies of Literary Schools of Ancient China, published as a collection of books, is an academic research project undertaken and accomplished by the faculty members of School of Chinese Literature of Wuhan University. Their research is based on the studies of writers and their works. Meanwhile, what they have done is far more deeper and wider than that, they are attempting to represent a thorough picture of literary schools of ancient China with a new way of thinking, making great progress especially in the respect of its systematicness and theoretical depth, giving their contribution to the growth of the subject of ancient Chinese literature. The writers of this collection have many fresh idea and subtle analysis upon the defini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literary schools. Many fundamental concepts and its root and interpretation, i.e., when and how did they occur to and develop in the literary history, are not only convincing in its conclusion, but also new and inspiring. Among which such as source and stream consciousness, leadership consciousness, style consciousness of literary schools; idealistic personality of literary school of Xuan, the rationality of Taige Style, the redivision of the literary schools of novel theory, they can be regarded as the model of combining the testified proof with the theoretical analysis. Besides, the Studies of Palace Poetry by Professor SHI Guan-hai, make up a vacancy among the studies of the history of Chinese poetry. All the writers of this collection have undertaken the academic study for a long time. Their collaboration is focusing on the related aspect as a whole, as well as displaying their individual interest, which will do good to the formation of schools of literary study.

Key words: Chinese ancient literature; studies of literary schools; schools of literary study